

# 新五年計劃中的 勞動生產率與減低成本

山. 杜烈茨基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五年計劃中的  
勞動生產率與減低成本

山·杜烈茨基著

李 紹 鵬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0970

新五年計劃中的勞動生產率與減低成本

---

著者：山 · 杜 烈 茨 基

譯者：李 紹 鵬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 華 印 刷 廠

---

1—5,000

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初版

## 目 錄

|   |                              |    |
|---|------------------------------|----|
| 一 | 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與社會主義積累·····     | 一  |
| 二 |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社會主義工業質量指標的改善·····   | 三  |
| 三 | 新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積累的増加與減低成本·····    | 三六 |
| 四 | 新五年計劃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 五〇 |
| 五 | 改善對物資的利用是減低成本的因素·····        | 五九 |
| 六 | 縮減管理費，消除不生產的支出和浪費·····       | 六九 |
| 七 | 減低成本、加速資金周轉率與提高社會主義工業贏利····· | 一二 |

## 一 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與社會主義積累

積累問題是屬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的經濟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與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學說有不可分的聯系。蘇維埃工業化的方法，在十三年中保證了我們的國家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通常需要五〇至一〇〇年。這種方法同時給建立大規模工業所需的資金積累確定了原則上的另一種性質。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發展史證明輕工業是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底首要的對象，它無需巨額基本建設投資，由於資本的迅速週轉和資本有機構成低於重工業，輕工業保證有較高的利潤率。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之下，僅在長期的積累輕工業利潤並把這項利潤存入銀行俟有足夠大規模投資所需的數額之後，才開始輪到重工業的發展。這一方法意味着，國家要長期停於無重工業的狀態中。『黨記住了列寧底指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國共產黨也就排斥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這種困難是

可能克服的』（斯大林：『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單行本，二七頁）。

必須在短期內建立重工業，作爲社會主義的改造蘇聯全部國民經濟和鞏固國防及保證我國經濟上的獨立的基礎，作爲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之決定性的物質條件，這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就已使得積累問題成爲亟待解決的任務了。建立蘇聯重工業所需資金積累問題之解決的方法和途徑，與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史上所週知的那些積累方法根本上是不同的。『……這些國家裏的重工業所以能建成，是因爲得到了大批債款，或是因爲掠奪了其他國家，或是因爲同時採用了這兩種手段。黨知道這兩種手段都是我們國家所不可採用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四九八頁）。黨和蘇維埃政府在財政封鎖的條件下，沒有外來的奴役借款而能不依靠資本主義國家防衛和鞏固了蘇聯經濟上的獨立，同時靠國內資源而順利地解決了建立重工業所需的資金積累問題。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大轉變的一年』非凡的著作中曾指示：『……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底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三六六頁）。

在國民經濟恢復了以後的最初三年中，即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重工業建設的投資比帝俄在第一次大戰前十年（一九〇三——一九一三年）中全部工業固定資金的增加要超過一倍。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末，蘇維埃國家所擁有的固定資金比帝俄在第一次大戰前夜所擁有的稍少一點，同時在提高勞動者底幸福之下已能確保有很多倍的積累。而且應當注意帝俄工業固定資金的增加，大部分是靠奴役的外債和租讓而來的，這種奴役的外債和租讓曾把國家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態。根據一九〇〇年的資料，帝俄工業中的設備百分之六〇是舶來品；迄一九一三年這項數字稍微減少了。外資在帝俄工業的重要部門中佔優勢。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第一次大戰以前的時期內，帝俄用在進口上的支出，超過付給產業工人的工資總額一倍半；每年的進口價值比工業投資總額高到五倍。

十月革命後，工業，運輸和銀行的國有化，對外貿易國營的建立等保證蘇維埃國家有了集中掌握資金的可能，以投資於重工業建設。『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運輸和信用，國有化的對外貿易，由國家調節的國內貿易——所有這些都是能用以發展我國工業的「追加資本」底新的來源，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還沒有這樣的來源呢』（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六月在斯維爾特洛夫大學演說』，『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原文一七一頁）。

在第一次大戰以前的時期內，帝俄工業中資本家的利潤數額超過了工人底工資總額。資本家不事生產的寄生的消費費用佔去了數萬萬盧布。人民每年給沙皇清償債務而付出了鉅額金錢；農民每年以地租方式向地主支付了約五億金盧布；商業費用和商人、投機者及販賣者底商業利潤在商品零售價格中達百分之三〇——三五。

隨着對生產手段私有的廢除及私人資本之被排擠出於一切社會活動的範圍以外，在帝俄時代供國內寄生階級消費及外國資本家由以致富的鉅額金錢，現在在蘇維埃政權的掌握中則變成了增加積累及人民消費的來源了。蘇維埃經濟制度底優越性，是用勞動生產率不斷的提高和減低生產費的方法來保證積累和消費之有系統的增加。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設計國家計劃底基本任務時，曾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合理的利用物資，克服經濟上的困難和嚴厲的節約資金，保證正確的分配社會生產品等等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時列寧指示：『要不斷地注意，這就是說，對於燃料和糧食的合理利用，對於最高額的燃料和糧食的收購，對於最高額的運輸，對於燃料的節約（工業和鐵道等部門中的）和食物的節約（祇養活良好的工作人員），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要用生命來給予保證』（『列寧全集』，二六卷，四六七頁）。

列寧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曾指出生產內部的積累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之最重要而基本的來源（『列寧文集』，二七卷，四一七頁）。



對生產手段社會主義的所有和剝削的廢除，勞動者底勞動條件和生活之根本的減輕與改善等，在經濟建設最早階段上就已促進了勞動生產率有系統的提高。一九二六年的工業生產總量，在極高的勞動生產率 and 比帝俄資本主義的工業更好的利用固定資金之下，已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如果在一九一三年用在價值十盧布的全部生產品的生產上約費去了八小時的勞動（以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價格計算），那末，在一九二六年在同樣數量的生產品的生產上，只費去約五小時勞動。雖然工作日大為縮短了，但每個工人底生產額在一九二五年末比在一九一三年高得多了。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黨為生產節約，為堅決減少和廢止不生產的支出及浪費所進行的鬥爭，在加速完成恢復時期和積累資金以過渡到國家工業化的事業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為黨和政府，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採取了措施，工業生產成本的減低給國家節約了約二〇億盧布，這在當時是很巨大的數額。

分配積累資金的原則，保證了投資的主要方向是在重工業上面，同時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建立了進一步的技術上的改進和有系統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以及減低商品生產費用等所需的前提。在發展重工業基礎上的勞動技術裝備之不斷的增加，經常使經濟節約內部的新來源產生了，使在這一基礎上增加社會主義積累的新的可能產生了。黨不斷地要求經濟工作人員們勿讓這些可能逸去了，勿鬆懈關於減低成本，關於靠儉省

和根絕不善經營才能增加人民財富的顧慮。『……因為有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工業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一貫減低成本費，鞏固勞動紀律，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的口號』（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三〇二頁）。

在爭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期中，工業從減低成本的節約中獲得了七〇餘億盧布。在一九二九年——三〇年工業投資數額爲五〇億盧布，而一九二六年——二七年僅一〇億盧布。

有系統的減低生產成本的任務屬於蘇聯國民經濟發展基本問題之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問題是與這項任務有聯系的。

斯大林同志遠在一九二七年發揮蘇維埃工業化的方法底理論原則時曾指示：『我國工業必須循着前進的基本路線，應當決定工業今後一切的步驟，這就是有系統的減低工業生產成本的路線，有系統的減低工業品售價的路線。這是一條大道，我國工業必須循着這條大道前進，如果它（工業——譯者）願意發展，如果它願意鞏固起來，如果它願意領導農業，如果它願意鞏固和擴大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列寧和斯大林論青年』，蘇聯少年先鋒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二八九頁）。

有系統的減低生產費用，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底法則。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生產費用的減低大都靠降低勞動者大衆底生活水準而達到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減低生產費用，對於工人和職員底物質幸福是直接的威脅。在戰前各屆斯大林五年計劃中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質的指標真正的改善除保證蘇聯國民經濟中有積累外，並保證大衆消費有了不斷的増加。祇要舉出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機器製造業成本減低了百分之三三，而機器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四一事就夠了。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機器製造業生產成本減低了百分之四六，而平均工資近乎倍增了。

石油成本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減低了百分之三八，而石油業工人的工資，在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六〇，黑色冶金業生產成本在一九三七年比一九三二年減低了百分之二〇・七，而冶金工人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一〇五・八。

根據約略的估計，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時期內，社會主義工業中的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改善利用生產資料的效率，使得比一九三二年多有了四八〇至五〇〇億盧布的節約。其中約二八〇億盧布用在増加平均工資上面；約九〇億盧布用在農業上面，以鼓勵工業原料和農產品的生產；餘額則用來増加工業投資。

在第三屆五年計劃中，節約總額的百分之七〇，指定用在増加平均工資上面，百分之三〇用在増加投資上面。

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保證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上的改進有無限的可能。廣泛的利用生產中的科學成就的可能，基於社會主義競賽的先進企業和優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底經驗的普及；爲有系統的減低蘇聯國民經濟中的貨品生產費用建立下客觀的前提。

各屆斯大林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是與爭取節約，動員經濟內部力量和可能的鬥爭，有不可分的聯系的。斯大林同志總結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曾指出節約在保證供給我國工業化以資金和五年計劃的實現上有決定性的作用。

節約底來源和減低生產費用水準底因素，在社會主義建設各時期中是不同的；隨着蘇聯國民經濟的發展，生產內部的積累底規模也增大了。國內戰爭以後，在蘇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生產費用水準的大爲減低，基本上是在利用和有系統的增加帝俄舊設備就業的基礎上而達到的。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時期和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質的指標之改善是與認真的合理化的措施之實現及生產勞動組織之改善有聯系的。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新技術基礎底經濟效率則與精通新技術，特別與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之順利完成有聯系。

國民經濟中生產內部的力量和節約的可能，隨着新技術的發展和精通，隨着科學發現、科學發明和合理化的增加而擴大了。

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被准許的支出水準，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尤其是在第三屆

五年計劃時期，已經不能認為是正常的了。迄第二屆五年計劃末全部工業產量的百分之八〇以上，是在新的或完全改造的企業中生產的；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全部車床有一半更換了新的，工業中每個工人底電器裝備增加到兩倍以上；掘煤、採取石油和泥炭、捕魚及其他較笨重的費勞動力的工作在本上都實現了機械化。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各色各樣的舊型車床在車床製造生產上佔優勢；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已精通了製造高度生產的自動化的車床，這種新型車床能保證生產過程的加速和勞動支出的減少。化學的發展使得能綜合的更經濟的利用原料和燃料及把廢物變為有用物的可能擴大了，利用副產品瓦斯作為燃料和原料。鑄造、自動鍛結和軋製的先進方法以及其他的生產先進方法的應用在機器製造業中，給機器製造業建立了根本減少金屬用額和勞動支出額所需的條件。事先把原料從原料來源地運至生產地然後運至消費區，已成為不合理的了，過遠距離的了。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底增加總額約三分之二是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達到的。社會主義工業中改善質的指標的節約，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計有一八〇——一九〇億盧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第三屆五年計劃時期是擴大再生產底決定性的因素。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內，特別是在第三屆五年計劃時期內燃料、材料和原料的節約底意義在生產內部的積累底總額中顯著地增大了。在一九四一年前半內工業生產底成本減低數額，近乎比一九四一年的國家計劃所規定的任務超過了一倍。

國民經濟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自始就建立下了保證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生利所必需的前提。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決不可以用商人眼光，決不可根據眼前情形來觀察生利問題，而應從全部國民經濟幾年情況的觀點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爲真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五一三頁）。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一年除提出精通新技術的任務以外，同時還提出了靠重工業，首先是靠機器製造業來建立積累新來源的任務，機器製造業必須與積累舊來源（輕工業和農業）同樣地開始供給積累。這一任務在順利的精通技術的基礎上也完成了。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內，重工業靠改善質的指標而減低了成本百分之二七。同時機器製造業生產成本的減低計達百分之四五。迄第二屆五年計劃末，即在一九三六年，國家預算補助費內所有工業部門中近乎全取消了。這樣徹底的執行黨在社會主義的改造國民經濟事業上的政策，保證所有部門有了生利工作的條件。沒有外來的追加資本而解決了積累問題，在如此短的時期中建立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這只有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之下才可能，其時價值法則已不能引起平均各部門間利潤率的生產價格法則底作用了。斯

大林同志在與英國作家威爾士談話中指示：『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強人民大眾特別需要之生產品的工業部門之生產為前提。可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擴大完全根據另一種動機而進行，即資本向着利潤率較大的那些經濟部門。您決不能強迫資本家為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使他自已蒙受損失和同意最小的利潤率』（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原文六〇〇頁）。

顧及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和前途來解決生利問題的可能，建立合理的計劃價格制度的可能——所有這些在如此短的時期中促進了國家工業化的實現，促進了蘇聯軍事和經濟力量的鞏固，促進了蘇聯經濟上獨立的穩固。

蘇聯埃國在國民經濟計劃底基礎上，不僅規定了每個部門和各社會主義企業底物質生產量，而且也規定了生產所需的社會必需支出。

勞動和成本之設計，關於生產支出的計劃任務之規定決定於下述一事，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生產受社會之現實的預定的統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範圍，和由這種商品來滿足的社會欲望的範圍之間，創立一種關聯』（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一九四八年郭、王譯本，一三四頁）。

顧及技術的改進，製造方法和生產組織及勞動組織的改善所有的經濟效果而規定出來的計劃成本，對於每個社會主義企業，是准許用在生產上的支出水準的標準，是正確

的開支國家資金的標準。

成本的設計在這一點上起很大的組織的作用，同時使得每個企業向着保證有系統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善對生產手段的利用看齊。減低生產成本的計劃是以利用生產中的最新的科學技術成就為出發點；有系統的減低成本則以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底進步的特性為基礎。

除開提高勞動生產率計劃和在使用原料、器材、燃料、電力和設備方面計劃定額外，減低成本設計底經濟上的目的和意義至少決定於以下三種情況：

一、關於改善技術標準的任務，觸及多種相互間不能比較的有生勞動和物質勞動具體形態的支出（一定職業與熟練程度的工人底工作定額，各種金屬、煤、泥炭、棉花、電力等用額）；關於減低成本的任务決定生產過程中利用這些多種的與它們底質的差別和特性無關的有生勞動和物質勞動支出的貨幣表現的經濟效率。這樣一來，減低成本計劃就與企業底全部生產活動，與社會勞動支出的全部總和有聯系了。

二、減低成本計劃不僅反映出每件產品的勞動和生產資料支出水準的變化，而且也反映出按勞致酬的水準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水準的變化。剩餘生產物的增加視生產量的增加而定，視勞動生產率之提高速度和工資之增加速度兩者的相互關係以及生產資料之節約而定。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之高於工資增加速度，乃是增加剩餘生產物和減低成本



的決定性的前提。這就是說，減低成本之計劃必須保證新創造出來的價值能正確的分爲積累和消費的兩部分。

三、減低成本計劃的完成，大部視用以鼓勵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按勞致酬的正確的制度而定，視鼓勵節儉使用原料、器材和燃料以規定生產資料價格的正確制度而定。社會主義按勞致酬的原則和合理的價格制度，令人對於有系統的改正陳舊的技術標準，合理的利用生產資料和提高每一個盧布之支出在生產上的經濟效率表示關切。

計劃成本是實現盧布監督支出水準的最重要的前提；實際成本之偏離計劃成本，應以盧布來限制其影響的發展，以便改善企業工作底質的指標。

生產成本是社會主義企業在某種產品生產上支出的貨幣表現；生產成本構成產品底一部分價值，即貨品底社會生產費的一部分。社會生產費，即是說貨品底價值，決定於它底（貨品——譯者）生產所需的社會必需勞動。剩餘勞動體現在其中的那一部分價值不列入生產成本之內。企業中工人和職員的工資，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器材、燃料和電力底價值，固定資金消耗部分（折舊）底價值以及公務費（運輸、通信、租金、信用等）都屬於各企業底開支。

在各部門各企業的產量生產上所需的各種各樣的一切支出之下，它們（支出——譯者）按其經濟上的特徵可再分爲與支付有生勞動有關的支出及與支付上次的物質勞動有